■域外人语

保尔森笑容后面藏着金融博弈

□梁雨霞(德国)

现年60岁的保尔森像个小蜜蜂，忙忙碌碌地在太平洋两岸飞来飞去。看起来,这位美国财长很关心亚太地区的财经甜头，并迫不及待地想身体力行，为亚太财经界构造共生共荣的美好愿景。

不过，由于东西方文化不同,西方人常常抱怨说，亚洲人太高深莫测，在亚洲人的点头哈腰和讪笑后面,藏着太多东西。但是话虽这么说,西方人还是一边抱怨,一边也把亚洲人的礼仪学得青出于蓝了。保尔森不仅对中国不陌生,而且曾被视为美国银行界的“中国通”,十几年间访华70次。你看,他的脸上就很有耐心地挂着微笑,嘴上也说着好听的话。

此时，如果一个中国人真的以为自己已经强大到连美国都来频频示好,就未免太天真了。

要知道，美国人不都是活雷锋,这些年,为了其全球利益,美国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全球热点地区的行动。对此,我们甚至不需要有丰富的联想就可以知道,在保尔森的后面,不乏中国通的指点。微笑和高帽子,当然比疾言厉色更让有好大喜功缺点的人受用。美国人把中国人的东西琢磨得通透,中国人又怎样呢?

人民币升值，让中国人的钱变大,听起来对中国不无好处,钱大到一定程度，中国的贸易顺差就要变小;听起来对美国也不无好处——真的是个双赢的结果吗？没那么简单。在这个幌子后面,有很多算计,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因为,本来“廉价”的货币符号下面,有源源不断的廉价商品向美国输送，这是实实在在利益,为什么不要呢？从这点上看,人民币升值,并不符合美国的长远利益。

其实，这里隐含着一种时空上的战略考虑。美国人再三强调升值的时间,并选在2008年之前施压,至少有两方面的考虑。第一,冲着中国的剩余流动性而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中国还不是老手，毕竟缺乏国际金融博弈经验。所以,在金融开放之下,热钱大进大出,管理和调控难度是非常高的。稍有不慎,在几番炒作震荡之后,中国经济就有可能元气大伤。这是很值得担忧的。第二,2008年奥运会之前,台海局势十分微妙。现在剩下的时间不多了,对谁来说都需要特别小心。

从国际金融操作道理上讲,一个涉及多项敏感点的货币，不仅不应该升值，而且需要审慎对待。那么,在这样的时候,为什么人民币反而不贬却升呢？这多少让人疑惑。

这里，有一个与GDP有关的问题需要说一说。现在多数人看中国经济增长，主要看GDP指标。但是GDP不是GNP。GDP是国内生产总值,不是国民生产总值,一字之差,大相径庭。现在,在中国的经济中其实已经包含了在中国境内的外商的部分，而外商在中国经济所占的比重，也已经到了一个需要从经济安全的角度加以观察的地步了。

何以见得？以本次人民币升值为例,大家知道热钱总要兴风作浪,一方面某些热钱削尖脑袋要钻进来,另一方面有些热钱正逐步脱逃。热钱哪里来?来的钱意欲何为?脱逃的又是什么钱？热钱是凭什么确定何时进出？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熟知国际金融市场运作规则的老手自然要明了得多，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特别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难免不会陷于被动。热钱在中国游荡，表面上是剩余流动性以及金融开放的双重原因,深入分析,还触及地缘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比一般财经人士想象的要复杂许多。

比如,中国沪深股市的震荡,其实是有一定的必然性在里面的。投机资金之所以敢于弄潮，反映了信息的严重不对称。而国际游资嗅觉灵敏,在地缘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关系问题上，他们比一般的投资人要看得清楚，所以在操作上会更快、更狠、更利索。目前,一些游资在大量抛售亚洲股票,就很值得注意。游资冲浪冲得正欢，是什么钱在纷纷脱逃？急于脱逃的这些钱,本来好比越积越厚的冰层，其本质是各类外资企业的利润和历年扩大的投资规模正在变现。有那么丰厚的收益,为什么不落袋为安呢？他们没有理由不这么做啊?

改革开放这些年来，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使得外企尽管以支付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等为由，向其母国做了大量的利益输送，但还是剩余了不少利润，这些利润以人民币资产的形式投入了扩大再生产。催促人民币升值,可以使外国资产卖个好价钱。算算这笔账，也是个惊人的数字。当然,还有其他原因,可以让我们看到这场高难度的国际金融博弈是怎么展开的,又是朝着什么方向发展的。

从政前曾是高盛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华尔街年薪最高CEO的保尔森是个聪明人，身为金融专家，他不会不明白这笔账是怎么算的，也不会不明白他怎么做才对自己的国家最有利。保尔森在有礼节地微笑。对于他微笑后面的含义,怎么理解,我们当然也不应该含糊。

■经济学家学问故事

70年前，托尼在华研究农村

□梁捷

有一次去图书馆,去借英国老牌经济史学家托尼(R.H.Tawney)在1929年出版的名著《平等》(Equality)。书拿到一看,是当时出的原版,沾满了灰尘。翻开第一页,赫然写着托尼的签名。落款下面还有日期,1931年3月6日。恰好我去年读过最新翻译出版的《方显廷回忆录》,所以知道托尼那时正好在中国南开大学访问。书上还有一段托尼的亲笔文字,大意是感谢某某博士的热情照顾。可那位博士的名字缩写,却因为日久漫漶而看不清楚了。托尼这段文字上被恶狠狠地盖上了“注销”的图章,书后还贴了一张上海旧书店的标签,定价2.5元,只是不知它最后怎样又回到上海图书馆了。

网上可以查到托尼教授的签名,对比一下就知道真迹无疑了。

无论在经济思想史上,还是近代政治活动史上,托尼都是一个可以载入史册的人物。托尼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拿到现代史的学位,辗转几个学校任教以后,来到费边社巨擘韦布创办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他长年在这里教授经济史,影响了整整一代英伦的年轻人。

托尼的工作可以分成几个方面,每一方面都很了不起。一战前后,马克斯·韦伯是欧陆学界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他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非常轰动,后来被帕森斯翻译成英文,在全球范围内奠定了韦伯的学术声誉。当时对于韦伯的这套解释资本主义的理论,学界争议很多。最激烈的是同为德国历史学派继承人的桑巴特。他写了《奢侈与资本主义》试图完全颠覆韦伯的论证，说明不是节欲而是纵欲才催生出资本主义。另一位宗教学者特洛尔奇也写了《基督教理论与现代》批驳韦伯幻想的宗教分析。

英美的经济学界,似乎极少有人具备深厚的经济和历史学涵养,所以大家都很难对韦伯的论述插上什么话。只有托尼是例外。他对基督教有极深的研究,求学期间主要研究中世纪英国经济史。而教会史也是那段历史的一部分,他是下过苦功的。所以他在1926年精心写成一本题为《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小册子,扎实地讨论英国资本主义兴起时对教会很有限的作用,客观地批评了韦伯一些夸大的地方。这本小册子在西方流传极广,日后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领袖、当时还同样年轻的弗兰克·奈特就对这本书大加赞赏。去年,这本书终于有了中译本。

再看托尼在工人运动和工人教育问题上的影响。他本人始终是费边社核心成员,和韦布、拉斯基等人关系很深。托尼坚持费边社主张的“渐进地改良世界”原则,身体力行,加入“工人教育协会”,一干就是四十多年,其中一半时间是这个协会的主席。

费边社的思想较早传入中国,而且在知识分子中曾经时髦,所以国人对托尼其人其书并不陌生。现在很容易找到的书就有,1928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近代工业社会的病理》,1930年神州国光社翻译出版的《社会主义之教育政策》,主要是他讨论社会实际运作和教育的著作。当时在南开任教的蒋廷黻自称受惠于托尼极多,亲自翻译过托尼多篇论文发在杂志上。蒋廷黻反复称道《十六世纪的农村土地问题》,推荐给学生看。这是托尼拿学位时写的,至今仍是这个领域的经典。我们都知道,后来蒋廷黻最著名的学生是费正清,长期执掌哈佛的中国研究,现在已经反过来影响国内的历史研究。

1930年底,托尼应南开大学之邀访华。他可不是像罗素或者杜威那样来讲学或者游览,而想在中国扎扎实实做些研究工作。南开大学经济系建立不久,正由耶鲁毕业生何廉主持,加上同是耶鲁毕业的方显廷刚刚回国,很想联手大干一番事业。

据方显廷回忆,托尼到了中国就说想调查农村的土地和劳动状况。本来有资本在中国学生面前大吹一通的托尼,不愿多讲自己,只想工作。好在何廉与方显廷素来重视资料搜集和整理,可以便捷地为托尼提供大量第一手农村资料。托尼便利用南开的资料，加上一些访问访谈的直观感受,再有与何廉、方显廷等一流学者的反复讨论,在很短时间内写出了《中国土地与劳工》。这本书材料翔实,逻辑清晰,国内外颇多好评。当然也有不同观点，比他稍晚的霍普金斯大学的卜凯(J.L.Buck,即著名作家赛珍珠的丈夫)也组织人手在中国实际调查，得出结论和托尼有所不同。又过30年,张五常研究中国土地租佃制度时也读了托尼这本书，然后说,“此公对农业一无所知,经济也是门外汉。”熟悉张五常教授的人,应不会对这样的评语过于惊讶。

托尼对学术、对学生、对社会、对宗教都有极大的热情。素来狂傲的芝加哥政治学家列奥·施特劳斯也把托尼看作英伦极少能理解他的人。1982年，经济思想史专家里斯曼(David Reisman)写了《托尼、加尔布雷斯和斯密》,把这三位同时影响学术和社会的经济学家并举。这三人都对市场经济有极深的洞察，都忍不住关注国家,关注社会福利,情愿为了社会福利而部分放弃优美的学术理论。把托尼置于斯密和加尔布雷斯的行列里,我想,这是恰如其分的。

■知无不言

工具岂能当结论

——当心经济学的狭隘性

□袁 东

伴随中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复杂性的，是经济学者群体的分化。大家已经看到了他们当中一些人和某些声音的偏狭，他们将经济学当作了可以解释一切的万能钥匙。而事实上现代经济学日益脱离了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所具有的那种宽阔视野，成了越来越狭隘的分析与解释工具。可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某些经济学者竟然将这越来越狭隘的工具当作了当然的结论，并在各种涉及到国家与社会运行的重大决策场合大肆鼓吹,得出了一些本末颠倒和脱离社会经济现实的政策观点。

就说这绝大多数人离不开的铁路客运吧。在人口大流动的当今中国,急于回家过年和年后返城而迅速聚集的排山倒海般的普通人群,自然会使“春运”期间的火车客运需求迅速上升,但供给却相对稳定。有些经济学者正是根据这一供求形势,从纯经济学的供求理论出发，认为“春运”期间火车票价应该提高,似乎这结论理所当然。但是,这一现实社会活动并非完全是由纯经济因素决定的,更不是全部由可以数量化的经济因素所决定。我国的铁路是由政府直接完全垄断的，供给者只有一家,根本没有竞争。在需求迅速集中上升的可确知期间，那个惟一供给者就涨价，而在平时不管需求如何起伏,也不降价,能说合理吗?

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将这一现象放在经济学分析框架内,在单个供给者完全垄断的市场上,供求决定价格这一工具的现实适用性和解释力就小得几乎没有什么说服力。更不用说,这里还有超越现代经济学视野范围的因素。所以,仅仅根据纯经济学分析得出的结论与政策建议,就难以合理,就不得人心,遭到普遍反对也是很自然的。

自20世纪以来，经济学迅速抖落掉古典经济学所积累起并娴熟运用的历史性与社会性成分,以及与之相联的分析工具，几乎自我封闭起来。切断历史而对微积分过于痴迷的经济学学者们一味陶醉于新古典经济学起始的精巧数学结构中。这些仅处于表层的“机械安排”使学者们忽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真正思想意义,陷于形式之中而看不见思想内涵。如此演化的结果,用“经济分析史”的大师熊彼特的话讲,终于使经济学退化成几近“纯粹的理论经济学”,甚至成了“数学的附庸”,数理逻辑替代了经济与社会现实和历史。而“理论经济学”或“经济理论”是什么?用上个世纪著名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的说法,就是“一箱子工具”。工具只是加工产品的器具与手段,无论如何都成不了产品,工具的不恰当运用无论如何也无助于有价值产品的形成。所以,经济学的工具无论如何也成不了工具运用的结论。

实际上，经济学的原意并非如此,至少到新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的马歇尔本人及其以前,经济学者首先是从观察到的社会经济事实出发,非常注重历史与社会因素,以及与之相随的历史性与社会性分析,因而与其他社会科学保持着密切的关联,经济学是开放的,并没有一味从“一箱子工具”出发,更没有自负到拿工具当结论。

依我看,迄今为止将经济学各种应有工具结合得最好,特别是将历史性分析与社会性分析作为经济学分析方法发挥得最佳,因而对现实社会经济过程分析解释得最服人的经济学大师或流派,非以下者莫属:马克思、以庞巴维克为主的奥地利学派、以桑巴特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斯·韦伯以及集大成者的熊彼特。

仅就分析体系与工具运用而言,马克思经济学远非今日狭隘经济学者所能超越的，其经济学概念的广泛,对纯理论经济分析工具同历史性与社会性分析工具的完美结合,从而对资本主义演变过程中的经济机制与经济制度所作的分析,及由此凝聚的思想,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奥地利学派在将边际效用学说作为其经济理论核心的同时,也强调经济学的社会性,对非经济因素构成的社会问题非常关注。而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桑巴特首次提出了经济社会学概念,韦伯则对这一概念予以了充分发挥,从其去世后由其夫人代为编辑出版的《经济与社会》就可看出这一点。现代经济学家中惟一对马克思主义作过认真研究的熊彼特,从庞巴维克那里继承了对社会问题的注重,将韦伯已经发挥得很好的经济社会学继续发扬光大。需要提醒注意的是,熊彼特几乎是最早大力提倡充分利用数学的经济学家,但他并没有沉湎于数理逻辑的“机械安排”中,而是明确提出并始终坚持经济学应该是经济史、统计学、经济理论与经济社会学四个部分的统一,对经济问题的分析必须从历史、统计、理论与制度等方面入手,反对经济学者轻易给出各种政策建议。

本来嘛,所有市场经济活动都是社会性的,人类的经济行为都是一代代传承着的，历史是延续而不可分的。所以,以专门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经济学,怎么可能离开了历史与社会性分析工具,又怎么可能回避社会问题而仅用单纯简单的数理工具来得出结论呢?

因此,无论是从经济活动的社会性与历史性本质看,还是从真正经济学的应有发展视野讲,在当今经济快速转轨且异常活跃的中国,经济学者应该跳出狭隘的眼界,正确综合而又科学地运用经济学的应有工具,少些偏执与自负,多些“现实世界”的感受与观察,更不能想当然地随手拿起件简陋的工具就当结论,工具永远不是结论！能否得出科学适用性的结论尤其是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政策意见,更是需要工具的健全完善以及对“一箱子工具”的正确运用。

■来自日内瓦

温和加息：中国央行不愿引起市场震荡

□徐千惠

上周末，中国央行上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由现行的2.52%提高到2.79%水平。那么,未来中国是否还会继续提高利率？相信这是一个市场关心的问题。

其实,不仅目前中国在关注加息，全球各国也都在热议和关注加息。我们注意到,在牵引全球利率水平变动影响中，美元利率是否会变化是一个核心问题。也就是说,在未来12个月中，美联储是否会调高利率水平或加息的幅度会多少?

让我们不妨先来分析一下目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动向。一般而言，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定期召开例会，会上会讨论是否要加息。从目前来看,市场普遍预期美联储将加息，这似乎已无悬念。问题是加息的幅度。按照笔者和绝大部分市场参与者预期,今后美联储将会上调联邦基准利率50个基点,即加息幅度为0.5%。

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的加息幅度。因为,如果美联储加息幅度超过50个基点,势必会对市场造成较大冲击。尤其是,在如今美国经济是否会面临衰退的巨大争议中，美联储不愿意因加息幅度过大而引起市场震荡。另外,目前市场或许还没有考虑加息将会对美国国债价格波动产生的市场影响，其实美国国债价格变动的市场影响可能更加深远。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国。从目前来看，在现行人民币汇率制度下,中国会继续维持美元利率和人民币利率之间相对固定的利差。除非未来美元利率快速上升,否则中国央行将不会改变现行的货币政策。

更为重要的是，在此次中国央行加息之前，中国政府已采取了提高一些投资高增长产业借贷成本的一系列间接调控手段。譬如，通过行政手段来提高了一些过热产业的借贷成本。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在提高企业借贷成本方面已领先于美国一步。笔者认为，中国政府所采取的间接调控手段是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选择,政策效果也在逐步体现。

由此可见,相对而言,市场对人民币加息前景的不确定性较小。也就是说,鉴于目前中国已采取的一系列间接调控措施已逐渐显效，预计中国央行在人民币加息问题上依然会采取相对谨慎和温和的态度。尽管我们需要继续观察未来美联储的加息动向,但这不妨碍我们预期中国央行不会大幅调升利率水平。就如同美联储一样，中国央行也不愿看到因人民币加息会对中国经济及金融市场产生大震荡与影响。

■本期人物话语

次级贷款风险不大会波及美整体经济

格林斯潘（美联储前任主席）15日在美国期货行业协会会议上表示，除非美国房价继续大跌，否则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风险不太可能波及美国整体经济。如果房价今年年内继续走低，这将导致次级贷款风险波及到美国经济的其他领域。目前，我们还没看到这个情况。

■多声道

提高消费率须调整分配增加低收入者收入

谢伏瞻（国家统计局局长）17日在第八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消费率下降不是国内需求下降造成外部需求增加,而是要素价格扭曲造成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失衡致使资源流出，降低了国内居民收入占比而影响了内需。我国近几年消费率下降有通货膨胀因素,同时投资的提高也挤占了消费增长。提高消费率的根本途径之一是降低经常项目顺差或资本金融项目顺差。另外,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政府所占比重上升和居民所占比重下降，降低了居民消费需求。因此,要提高我国消费需求(消费率),就必须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总体格局,增加低收入者收入,降低城镇居民支出的不确定性。

股市稳健发展增强了央行加息信心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17日向新浪财经表示,央行此次加息基于三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流动性在不断增加,这引起国家的担心；其次是最新的CPI数据,2月增长2.7%，清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判断是，今年的消费价格指数会有上涨；第三是股市走势比较稳健，大跌后没有一蹶不振。央行此次加息对股市影响不会很大，因为借钱炒股的人并不是太多，多数机构与个人还是用自己的资金炒股。

是中国在补贴美国

斯蒂芬·罗奇（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在近期美国国会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作报告时说,美国对华贸易失衡是国内储蓄不足带来的苦果,单纯通过“调整”人民币汇率不能解决美国或中国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要弄清楚究竟谁在补贴谁。中国买入美元资产,这意味着中国正补贴着美国利率；同样,中国在产品方面也在向美国提供补贴。

改进与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已成必然

汪光焘(建设部部长)3月13日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专访时说,改进与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已成必然。第一个规范是要在承认历史现实的基础上规范服务对象；第二个规范是要规范建设标准,即要向中低偏下收入人倾斜,希望面积也往下降，以80平方米以下为主；第三个规范是要规范管理方式,我们知道收入的管理是经济适用房管理的关键环节,我认为规范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自己诚实地申报，第二个社会公示公认,第三个必要的行政核定。